中国早期职工运动的 著名领袖——苏兆征

褚倩红 卢 权

苏兆征同志是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的组织和领导者之一，是我国职工运动史上的著名领袖。他崇高的革命品德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铭记！

一

苏兆征1885年生于广东香山县淇澳岛（今属珠海市）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的少年时代，正是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时期。侵略者不仅把洋货倾销香山，还大肆掠夺香山的桑蚕、塘鱼、蚝等农副产品。国内的官绅互相勾结，对劳动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除地租、田赋外，还有“设勇护沙”、“自捐自卫”、“鸭埠”、“沙捐津贴”等等繁多的负担^①。所有这些残酷压迫和剥削，使出身穷苦的苏兆征幼小的心灵上，播下了仇恨的种子。

贫困的家庭境遇，使苏兆征迟迟得不到读书的机会，在亲友资助下，勉强念了三年私塾。后来，在家乡无以为生，只得到香港外国轮船打工，先后当过“扫地仔”、“侍仔”等，每天往往一连干十几小时的活，还不时受到责骂和侮辱。每月工资仅得数元，还要受到包工头从中剋扣勒索。这种辛酸的生活，使他深深感到穷人到处受煎熬，因而更加激起了对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憎恨。

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为推翻清朝统治者而经常奔走海外，进行革命活动。在孙中山宣传影响下，苏兆征于1908年加入了同盟会^②，并积极参加了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活动。他和其他海员一起，冒着生命

危险，为革命党人秘密运送武器，筹集活动经费；在海员中进行组织活动，参加了“海员公益社”、“海员慈善社”等组织，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

苏兆征在当海员期间，有时亦因失业回到家乡暂住，他常向亲友邻居介绍海外见闻和孙中山反清情况，讲解革命道理。他并在村里组织了阅报社和自治会，与一些贫苦农民聚集一起，议论国内外大事，诉说地主豪绅压榨劳苦人民的罪行。激发大家的阶级觉悟。同时，他自己也更进一步树立了为群众谋福利的决心。

二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海员中，苏兆征也同其他海员一样，深为这汹涌澎湃的革命潮流所激励。此后，他认真阅读传播新思想的书报，努力从中了解革命的道理，不断增强反抗斗争的意志。

1920年，苏兆征正在一艘英国轮船上工作。有一天，工头无理踢伤了一名中国海员。苏兆征便挺身而出，发动船上的中国海员起来斗争。在他带领下，海员们一拥而上，找船长质问。船长见大家齐心行动，怕事惹大，只好答应赔偿医药费，以求了结。但苏兆征认为这不仅是一名海员的事情，而是全船海员人身安全的大事，因此带领大家继续

^① 《中山新志》第二篇第二章。

^② 邓中夏：《苏兆征同志传》。《中国共产党烈士传》，青年出版社1951年版。

进行斗争，终于迫使资方接受苏兆征他们提出的开除行凶打人的工头、不得任意虐待中国海员等项正义要求。

这次斗争的胜利，使海员工人受到很大鼓舞，并在海员工人中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由此认识到有进一步团结起来的必要，并感到原先建立的“海员慈善社”等组织，已远不能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因而经苏兆征和林伟民等海员中的积极分子积极筹建，1921年3月，在香港成立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这是中国海员工人第一个真正的工会组织，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工会组织之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为开展工人运动，专门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国工人运动因而有了新的发展。在汹涌的世界革命潮流和国内工人运动新发展的形势鼓舞下，香港海员总工会根据海员工人的切身利益和迫切要求，于1921年9月起先后三次向各轮船公司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反对包工剥削的要求。轮船资本家迟迟不作答复。于是，在苏兆征、林伟民等人的带领下，于1922年1月12日，毅然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大罢工。这次香港海员大罢工，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起点。

罢工期间，斗争形势极其复杂。一方面，香港英国当局与外国轮船资本家对待罢工始终抱着仇视和破坏的态度。初则采取威胁、高压手段来破坏罢工的举行；继而改用“调停”、“谈判”和“分化”等花招来诱骗罢工海员就范；最后又悍然实行血腥屠杀进行镇压。另一方面，海员工会一些领导人如陈炳生，翟汉奇等人，一再表现动摇妥协，干扰罢工斗争的进行。罢工队伍内部也存在着生活困难等实际问题。因此，如何带领近万名罢工工人（后来罢工人数发展至十万人以上）排除万难，坚持斗争，争取最后胜利，对于初出茅庐的苏兆征来说，确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与锻炼。

苏兆征当时虽然不是海员工会的会长，但他和林伟民等人却是这次罢工斗争的实际

领导人。罢工开始，他被选为罢工总办事处总务部主任。负责处理财务、罢工海员的生活安置等一切事务。后来海员总工会会长陈炳生因杀妻案被捕，全体海员大会推举苏兆征为代理会长，负责全面的领导工作。

在整个罢工斗争中，苏兆征始终坚持原则，立场坚定，与林伟民等人一道，处处维护海员的根本利益，不为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政策所动摇，不为资本家的甜言蜜语所迷惑，不为困难所吓倒，紧密地依靠全体海员和团结全港工人，争取国内外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罢工前，他们及时组织“海员加工维持团”，积极作好斗争准备工作。罢工后，他们善于掌握斗争时机，正确运用斗争策略，如将罢工时机选择在旧历年关时分，既利于争取社会同情支持，又能给予对方以有效打击；又为罢工期间采取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以及把罢工斗争进一步发展成为全港工人同盟大罢工等策略，使香港英国当局和轮船资本家陷于无法招架的地步。香港当局惊呼，香港海员罢工是“陷本殖民地生命于危险之境”^①，最后不得不向海员低头屈服。在苏兆征、林伟民等领导下的为时五十六天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以取得重大胜利而结束。

在罢工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这次罢工给予重要的支持与指导，使得苏兆征开始认识了党。罢工期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动和组织国内各地工人以各种方式大力支援香港海员斗争。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李启汉为支援罢工而坐牢，后来又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到香港亲切慰问罢工海员^②。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也及时发表了《敬告罢工海员》，表示“本党以海员同志们为开始阶级斗争的急先锋，定当竭其能力，为之后援”，“共同一致的望着我们的目标奋斗，以期待我们的最大光荣，最大胜利”^③。这样一来，

① 转引自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② 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香港海员老工人回忆资料》，油印件。

③ 见《敬告海员罢工》复印件，藏广东革命博物馆。

苏兆征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敬仰之情，感到中国共产党是为工人谋利益的党，劳苦人民的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于是下定决心跟党走干革命。

1924年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周恩来，陈延年等同志来到广东工作，大大加强了党对广东地区的革命斗争的领导。中共广东区委还派遣了一些党员到香港开展活动。苏兆征在共产党员的直接影响和教育下，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更加迫切要求参加共产党。

1925年春，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发动下，于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进会。苏兆征代表广东香港的工人团体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在北京期间有机会同李大钊接触，党组织也派人对他进行谈话教育。不久，他就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党的直接领导和培育下，成为一个自觉的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三

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于广州召开。苏兆征积极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这次大会成立了全国统一的工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并正式加入赤色职工国际。苏兆征被推选为全国总工会的执行业员。

不久，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屠杀我国同胞的罪行，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和领导下，香港和广州洋务工人于6月19日举行了举世闻名的香港大罢工。

在罢工酝酿和发动过程中苏兆征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和表现出杰出的组织才能。当时香港有一百多个工会，除少数产业工会外，大部分是行会和手工业工会，并操纵在资本家、封建把头和黄色工会工头的手中。而党在香港工人中的力量还较薄弱，因此发动罢工困难不少，党专门派了邓中夏、杨殷等同志到香港，与苏兆征一道组织发动罢工。他们一方面深入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发动，另一方面又耐心地争取说服一些工会的上层人

物。由于苏兆征在工人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信，所以大家都对他的罢工号召表示拥护。罢工首先从海员，电车等工会开始。但当罢工临头时，海员总工会长谭华泽却又犹豫起来，不肯下罢工令。在苏兆征的带动下，广大海员工人对工会说：“下不下罢工命令？不下我们就自己干！”会长无奈，只得下了罢工令^①。在海员工人的影响带动下，罢工象燎原烈火，顿时燃遍了香港。

罢工爆发后，罢工工人纷纷返回广州，在广州组织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及省港罢工委员会等组织机构，作为领导罢工斗争的司令部。广大罢工工人一致推举苏兆征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并兼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选举时，苏兆征仍在香港继续组织发动工人罢工，没有在场（他于7月中旬才回到广州），可见罢工工人群众对苏兆征的信任与爱戴，以及他在工人群众中威望之高。

在这次规模大、时间长的罢工斗争过程中，苏兆征与邓中夏、李启汉等罢工领导人一道，紧密依靠党的领导，坚定执行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尊重和发扬广大罢工工人的民主精神和革命首创精神，正确掌握运用“单独对英”等一系斗争策略，结果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给予香港英帝国主义者以沉重打击。省港军工对于促进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与巩固，推进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北伐战争的进行，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省港罢工过程中，苏兆征充分表现了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大公无私、任劳任怨的高贵品德，以及密切联系群众与罢工工人同甘苦的优良作风。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夜以继日地坚持工作，并按时出席隔日召开的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他兼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每天都亲自检查布置财务工作，千方百计筹措罢工经费，认真处理开支。他廉洁奉公坚持原则，一丝不苟，井井有条。因此，尽管敌人制造种种流言蜚语来中伤他，但广大罢工工

^① 中共广东党史委员会编印：《省港罢工老工人回忆资料》油印件。

人却始终信任他，把他视为完全可以信赖的知心人和当家人。正如邓中夏所称誉的：“在这样的庞大的组织中，百务丛错，真是一日万机。然而，兆征同志却处之裕如，以至于将近两年而不少懈，这可见兆征领导群众的艺术和解决问题的才能了。”^①

省港罢工期间，全国海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苏兆征在会上总结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斗争的经验教训，指出：海员工人必须打破帮口界限，进一步加强团结，使海员工会组织更加严密和巩固。会上，苏兆征被选为全国海员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随后，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在广州成立，苏兆征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于广州召开，苏兆征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6年10月，由于国内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省港大罢工自动结束。同年底，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办公。革命中心便从广州转移到武汉。

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苏兆征出席了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他受党的派遣，出任国民政府劳工部部长。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隐藏在国民政府内部的假左派汪精卫一伙也日渐暴露其真面目，他们与蒋介石暗中勾结，并多方压制工农革命运动。

在这革命的危急关头，苏兆征等人领导武汉地区的工人群众勇敢地进行斗争。当时建立的工人武装纠察队，曾协助叶挺领导的革命军队镇压了夏斗寅的叛乱，保卫了武汉。苏兆征还参加了战时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为巩固革命、维护生产、制裁捣乱的不法资本家、接管歇业的工厂企业等等，忘我地进行着英勇的斗争。

1927年6月下旬，苏兆征主持召开了在武汉举行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是对反革命的声讨和示威，是对国民政府压制工农运动的抗议，也是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正批判。大会指出：工人阶级

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反对一切反动势力，粉碎反革命大资产阶级一切扑灭革命、镇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阴谋”。大会对在国民政府统辖下的地区发生屠杀工农、摧残工农组织的反动罪行提出了抗议，要求国民政府严惩反革命分子。大会最后明确宣布：“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中国无产阶级将坚持斗争到底！”^②

大革命失败后。苏兆征和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一道，勇往直前，在白色恐怖中继续带领人民群众进行英勇的战斗。

四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是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起义军胜利地占领了南昌，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苏兆征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8月7日，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批判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撤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兆征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会议还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根据这一决定，各地党组织纷纷领导人民开展武装斗争。

“八七”会议之后，苏兆征从武汉到了上海，他除了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之外，还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工作。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中，苏兆征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化装外出，为组织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反抗斗争而奔忙，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定性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还抓紧时间认真刻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以提高自己的理论和工作水平。

1927年12月，在党的领导下，广州的工人群众和革命士兵举行了武装起义，建立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苏兆征虽然工作需要留在上海，没有直接参加起义，但他在中央亲

^① 邓中夏：《苏兆征同志传》。

^② 见《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

自参加了制订起义的总计划的工作，并被推选为广州工农民主政府的主席。

1928年2月，苏兆征离开上海赴苏联，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召集的第四次大会。还在大革命时期，苏兆征就积极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的活动。1924年5月，赤色职工国际派代表到广州召开太平洋沿岸运输工人大会，苏兆征代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出席了这次大会，对促进东方运输工人的团结和反帝斗争作出了贡献。1927年5月，赤色职工国际又在汉口召开太平洋第一次劳动会议，苏兆征是这次会议主席团的成员。会上决定成立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作为“联络宣传及行动的机关”，苏兆征被推选为秘书处成员^①。从此他逐渐闻名于国际职工运动。在1928年3月举行的第四次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上，各国代表都十分重视中国职工运动的斗争经验，专门组织了一个有三十五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委员会来详细讨论。大会对中国的职工运动问题，作出了有关决定^②，苏兆征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苏兆征在莫斯科还出席了第六次共产国际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的成员，并被选为新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后来他又应邀出席了苏联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大会，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情况的报告。这样，苏兆征便成为国际职工运动中享有威望的领导人之一。

在莫斯科期间，苏兆征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指出当时的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大会同时对错误路线展开了斗争，一方面进一步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及其危害；另一方面又严肃地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指出当前党内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因此“坚决的反对对于自己阶级应用强制和命令的办法，反对强迫罢工，强迫举行武装斗争的办法”^③。苏兆征在大会发言，坚决拥护大会的正确路线，对陈独秀放弃革

命领导权，断送工农革命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在这次大会上苏兆征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艰苦严酷的斗争环境，长期忘我的紧张工作，苏兆征终于积劳成疾，并患了阑尾炎。因身体虚弱，医生建议他在苏联先休养一段时间，待身体康复后再施行手术。但苏兆征一心惦念着祖国的革命事业，因而不顾医生和同志们的劝阻，毅然抱病回国。

1929年1月间，苏兆征回到上海，又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斗。2月中旬，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苏兆征在会上作了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的报告，并认真地把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和赤色职工国际对中国职工运动的决议贯彻到会议中^④。这次会议总结了工会过去的工作，明确了今后的任务，并针对过去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了改正的办法，对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会议结束不久，苏兆征旧病发作。尽管病情严重，但他不愿将病情告诉别的同志。直到他的病情恶化时，家人经过一番周折，才把他送进一家私人医院医治，但因拖延了时间，生命处于垂危状态，已无法治疗。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同志闻讯立即赶往医院看望他。这时苏兆征已是奄奄一息了。但他仍极力挣扎着，用十分微弱的声音时断时续地说：“广大人民已无法生活下去了，要革命，等待着我们去组织起来。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奋斗。”后来他又用手指着胸口反复地说：“大家同心合力一致合作，达到革命的最后成功！”^⑤苏兆征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对革命事业依然充满必胜的信心。

1929年2月25日，苏兆征同志因抢救无效，不幸与世长辞。他逝世的第二天，即2月26日，中央政治局向全党发出了悼念通告。通告说：“兆征同志在这几年的工作过程

① 《社会新闻》，第一卷第二十六期，1932年12月。

②③ 苏兆征：《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会报告》，1929年2月。

④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政治决议案》。

⑤ 访问苏兆征同志亲属记录。

中，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卓绝的精神和坚决的政治意识，的确是党的最好的指导者”，“兆征同志的革命精神，真是全党同志的模范”。通告号召全党同志要牢牢记住苏兆征同志“大家努力，达到革命的胜利”的遗言，“要一致地继承着兆征同志的精神，向前奋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也发出了悼念的通告。指出他的逝世，“不但是共产党的重大创伤，同时也使共产主义青年团丧失了一位得力的指导者”。通告要求共

青团员“继承他的精神，努力奋斗，以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1930年2月，苏兆征同志逝世一周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专门出版了纪念册，《劳动》周刊社也出刊了纪念特刊。1929年12月间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第四届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也特意为苏兆征同志的逝世默念致哀。

苏兆征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文学动态

中共党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及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

中共党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及学术讨论会于7月18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该会宗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学风，贯彻双百方针，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组织学术研究，交流教学经验，互通学术情报，交流参考资料，努力提高中共党史的教学和科研水平，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参加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有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32个党史研究会、筹备会、筹备组等的教学和科研人员251名，并有部分有关同志列席了会议，是建国以来党史界的第一次盛会。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做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主任胡华做了《周恩来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理论贡献》的报告；王琪做了关于《党史教学大纲》的修改情况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做了《关于党史研究中的问题》的报告，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副主任缪楚黄做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上的问题》的报告，此外，张弓、向青等也在会上做了专题学术报告。

与会者着重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每个代表都本着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百家争鸣的精神，对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中的各种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以促进今后的科研和教学工作。

大会经过民主协商，讨论通过了中共党史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由65人组成的党史研究会理事会。选举冯文彬为会长，曾三、李新、廖盖隆、胡华、马齐彬、王实、董谦为副会长。与会代表一致同意聘请李维汉、王首道、肖克、何长工、成仿吾、舒同、吴亮平、徐彬如、刘型、莫文骅、刘英、奎璧、李正文为研究会顾问。

会长冯文彬在闭幕会上讲了话，他首先调强了党史研究的重要性，并要求党史研究工作者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全面材料，做到党史研究成果应具有准确性、科学性和严密性，在任何历史条件下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要把党史研究的专业和业余队伍组织好，共同来做好党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轩)